

怀故人

怀念任允好老师

李镇

有一本书我寻找了好久。寻找这本书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病。

这本书不是鸿篇巨制，也不是名家经典，而是一本没有正规书号、装帧简单、用于朋友间交流的散文集，书的名字叫《翡翠集》，作者任允好。

任允好是莱山区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——我的忘年交，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。

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，苦苦寻觅，究其原因是我对作者任老师深深的思念。

多年前，我在牟平一个偏僻小镇从事宣传工作。那时候，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小白，带我入行的师傅是资深“新闻人”老孙。在他的介绍下，我有幸结识了任老师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和任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情形。

那是个秋日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射进屋里，安静而惬意。我和老孙正在赶写稿件，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敲开了我们办公室的门。

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来者：中等个头，粗口大唇，一脸沧桑，身着一件浆洗至发白的灰色中山服，一双粗糙大手满是老茧。他提着一个那个年代很流行的黑色合成革书包，包上写着四个醒目大字“北京旅游”。

老孙介绍说，这位就是人称“小镇一支笔”的任允好老师，他和老县长孙德汉是一起写报道的搭档。

任老师面带笑容，自谦说，什么一支笔呀，充其量是个爱好者而已。写作这条道路没有尽头，咱们都是小学生。

落座后，任老师接过老孙递过的大搪瓷缸，咕咚咕咚地喝下了半缸子凉白开，接着，他从书包里掏出厚厚一沓稿纸和一个笔记本对老孙说，我写了一篇稿子，你给看看有什么不妥？老孙接过稿件认真读起来。读罢，两人又热烈讨论了一番。

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任老师起身告辞，他说自己下午还有一节语文课，要赶回学校给孩子们上课。

送别了任老师，回到办公室，老孙点起一支香烟，对我讲起了他熟悉的任老师。

老孙说，任老师既正直、善良又多才，不过命运多舛，人生坎坷。他出生在农村，家境贫寒，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。在那个生活拮据的年代，母亲拉扯他们一大家人艰难度日。

逆境中，他像顽强的小草向

阳而生。困难里，他如峭壁上的崖柏矢志不渝。1958年，任老师考取了烟台一中高中部（后来任老师告诉我，考学那年，1万多名考生，烟台一中共招生432人，他被分在高11级8班）。三年高中时光，他是住校生。每个星期六下午放了学，都要步行30多里路赶回家中，帮母亲上山下泊干农活，打猪草割芦苇赶小海，减轻家庭负担。星期一早晨，为了不耽误学业，他又要披星戴月徒步赶回学校。三个寒来暑往，周而复始，不放弃，不抛弃。

在学校，任老师除了认真完成学业，还参加了魏柏桐老师组织的“文学创作小组”。他和师友们一起学习写作知识，探讨写作技巧，分享写作经验。这段时间的历练，给他一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可以说，任老师的文学梦就是那时候破土、发芽的。

写作的爱好伴他终生，因为爱好写作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1963年，高中毕业后，窘迫的家境导致任老师无法继续求学，只能回到家乡务农。他在辛苦劳动之余，开始了新闻报道写作。1965年，他参加了《中国青年报》征文比赛，获得优秀奖。这次获奖让他信心满满，更加笃定前行。

老孙说，我很钦佩任老师的顽强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。当年他写稿件的条件远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。为了赶时效，他经常要到报社送稿，没有自行车，也不舍得花钱坐公交车，往返八十里路都是脚板丈量，常常是返回家里时已经星光灿烂，月上枝头。那时候，任老师虽然已经当上民办老师，但收入微薄，为补贴家用还种了好几亩地。他采写的稿件都是牺牲休息时间完成的。

那次美丽邂逅，扬起友谊风帆，我和任老师成为至交好友。他经常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大金鹿自行车，一头汗水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任老师亲切、随和，脸上总挂着浅浅的笑意。他率性、清澈，从来不端架子。

他的亲和力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近期见报的稿件，畅谈创作心得，介绍正在写作的内容。我们也把自己选好的主题讲给他听，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他看，请他提提意见、把把关。他总是知无不言，开诚布公，不藏不掖，一丝不苟。那些日子，和任老师每一次相见都是快乐、灿烂的时光。每一次相见都让我获益匪浅。那是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。

还记得有一次闲聊时，我问任老师，您现在也转正了，有了副高级职称，工资也不低，衣食无忧，用不着这么拼吧？任老师意味深长地说，我永远不会放弃写作。我要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写到老。我又问，听说您还种地？他干脆地回答，种，咋能不种呢？农村人永远不能离开土地，条件好了，也不能忘本！

后来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和任老师见面的次数少了，但我依然能在报刊上见到他有温度的稿件。每一次读他的文字，我都会从心底里涌起一番感动，我就会想起和任老师在一起的温馨时刻。我总警示自己，谦逊、低调、执着的任老师身体力行地引导着我向前走，作为后来者，我有什么理由懈怠？又有什么理由固步自封，或者轻言放弃？

2009年末，任老师自费出版了散文集《翡翠集》。他托人给我捎来一本。捧着这本书，我觉得沉甸甸的，似乎捧着任老师滚烫的心。

可惜，由于保管不善，我竟将这本书遗失了。我一直引以为憾，心存愧疚，并多方寻找。

2014年，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，有幸和毛贤君老师坐在一起。毛老师和任老师是高中同班同学，也是当年“文学创作小组”成员之一。他深情地说，自己和老任相识多年，来往频繁，知根知底，老任是个好人啊。他退休后，退而不休，心系桑梓，不但笔耕不辍，还坚持做公益。他在滨海街道老干部支部当书记，不计报酬为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。多年来义务接送附近小学的孩子上下学。他结集出版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翡翠集》，一本是《乡土文集》。这两本集子是他多年来坚持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的结晶。

毛老师的话，更增加了我寻找《翡翠集》的执念。

皇天不负苦心人。前几日，我与小镇文史学者老李小聚。我们的话题从他目前正在撰写的家族传记，聊到了已经远去的任老师。聊起了他的人格、学识和他的写作。我道出了自己的心病。李老师说，他手头收藏着一本《翡翠集》，是多年前别人送他的，可以转送给我。我大喜过望，欣然接受。

万籁俱寂的秋夜里，孤灯下，又一次捧读《翡翠集》，凝望扉页上任老师的照片，前尘往事涌上心头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又是一年中秋节，在这个充满思念的日子里，我想说，尊敬的任老师，您永远住在我心里。

父亲是个“多面手”

程绍堂

我的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有着壮实的身板和粗壮有力的双手，面相敦厚慈祥，被村民们称为“多面手”。

父亲是一位“庄稼把式”。虽说他识字不多，没有太多文化，但却特别聪明，农家的活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能，尤其是庄稼地里的活，不论是种植技术，还是管理方法都堪称一流。他耕种的地平整而细发，打的地瓜垄和整的麦畦子又直又平，播种的庄稼匀溜适度，极少断垄，庄稼什么时候浇水、施肥、铧锄、间苗、杀虫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管理的庄稼苗全苗旺，收成也高。大集体时，几乎村村都搞样板田，样板田标准高、要求严，生产队都要挑选拔尖的“庄稼把式”来完成这项任务，父亲成了这一任务的骨干。公社组织样板田检查观摩时，父亲参与的样板田经常被当作范例，深受好评，给生产队争了不少光。

父亲还是一位能工巧匠。家里的院墙、猪圈、牛棚、鸡舍、火炕、灶台等都出自父亲之手。至今，老家的这些建筑和部件仍然完好无损。人民公社时期，公社成立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”（简称“战山河”专业队），从各村选调工匠，父亲被选调去当了瓦匠头。施工队在父亲的带领下，承担的工程进度快、质量好，屡屡被评为优质工程，其施工队荣获优秀施工队称号，每每受到上级的表扬。父亲也因此出了名，并结交了不少朋友。村里有什么建筑工程或私人盖房子，都少不了父亲的参与。

家里用的扫帚、笤帚、炊帚、箢篱、箩筐等生活用品，干活用的锄镰锨镢，都是父亲自己制作、整理的。他编的箢篱、篓子、箩筐等拿到集上卖，也是抢手货。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，父亲也能手到擒来。那年月，吃穿都很困难，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缝了再缝、补了又补。我们的鞋子破损了，父亲立马就会修好，照样可以接着穿。父亲编制的呱嗒窝（用蒲草编织的木板底靴子，能抵御严寒，不冻脚），美观而保暖，使我们免遭冻伤，度过了一个个寒冬。那时乡下没有理发店，农村人理发都是相互帮着理。父亲不但包办了我们弟兄几个的理发，还经常给街坊邻居理发。父亲做的弹弓、陀螺，成了我们弟兄几个少年时最喜爱的玩具。父亲做的豆面灯、萝卜灯，为我们过元宵节增添了乐趣。酿曲酒、做豆腐、打冻肴等都是父亲的拿手活，为我们增添了难得的美味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家六畜，父亲除了马没养之外，其它家畜家禽都养过。父亲养的猪育肥快，出栏早，一般家庭一年只能育肥出栏一头，我家则是两年3头。父亲养的母羊产羔率和成活率都相当高，所产羊羔经常被村人预定，根本用不着到集上去卖，留的种羊成了许多养羊户配种的首选。总之，凡是父亲饲养的家畜家禽都格外精神，很少生病，死亡率特低。父亲还被推举当了多年生产队的饲养员，并被评为“模范饲养员”，光荣地出席了县里召开的表彰大会。

父亲不仅是个“多面手”，而且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，凡是别人有求于他的事情，他从不拒绝，谁家有什么难事，经常会请父亲拿拿主意、想想办法，街坊邻居打架吵闹，也会请父亲劝说调解。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很高，口碑颇佳，是出了名的好人。

父亲经常说：“一个男子汉必须会两手（手艺），有了手艺才能养家糊口，立足社会。”在父亲的教导和熏陶下，我十几岁就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农活和家务活，成了父母的帮手。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使我受益终身。